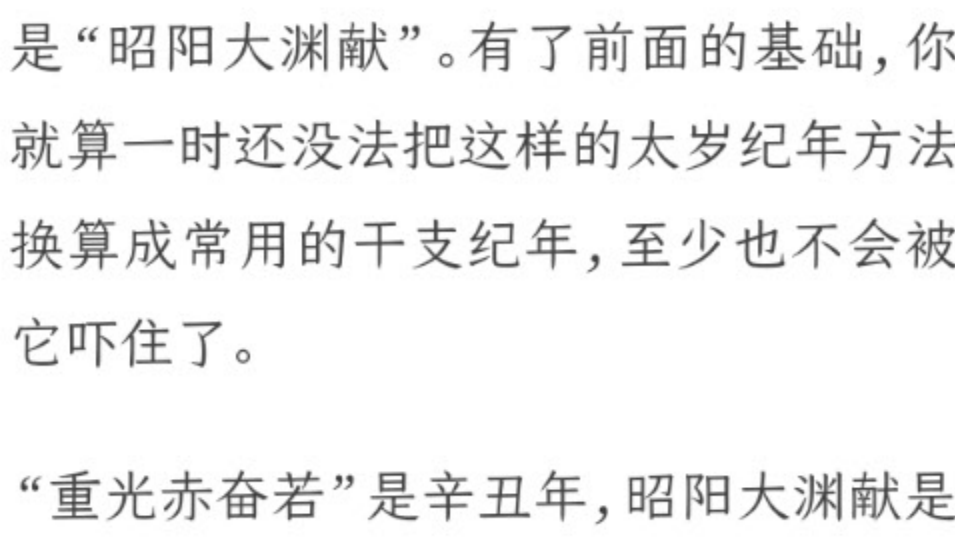




001 造像和立碑有什么用处？

熊逸讲透资治通鉴²（年度日更） [进入课程>](#)

06-12



金北平讲述

你好，欢迎来到《熊逸讲透资治通鉴2》。

周纪三

起重光赤奋若（公元前320年），尽昭阳大渊献（公元前298年），凡二十三年。

从这一讲开始，我们进入《资治通鉴》第3卷，“周纪”的第3部分，起始年份是“重(chóng)光赤奋若”，截至年份是“昭阳大渊献”。有了前面的基础，你就算一时还没法把这样的太岁纪年方法换算成常用的干支纪年，至少也不会被它吓住了。

“重光赤奋若”是辛丑年，昭阳大渊献是癸亥年，按照公历纪年，“周纪三”的历史记载起始于公元前320年，截止于公元前298年，历时23年，包括了周慎靓王在位的短短6年和周赧王在位的前半段共17年的时间。

造像与立碑

让我们暂时从中国的历史版图上抽身出来，放眼看看世界。

在这段时间里，全世界仿佛到处都在锣鼓喧天。西边，随着亚历山大大帝的英年早逝，地跨欧、亚、非三大洲的马其顿王国被三大武将瓜分，而亚历山大大帝生前要把希腊文化发扬光大的理想非但没有因此枯萎，反而方兴未艾，以至于18世纪的欧洲史学界把这段时期称为希腊化时期(Hellenistic period)。

我们很熟悉的三大雕塑杰作——断臂维纳斯(Venus de Milo)、胜利女神(The Winged Victory of Samothrace)和拉奥孔(Laocoön and his Sons)，都是这一时期的产物。

造像艺术在那么久远的年代就已经被玩到登峰造极了，这对当时的管理技术很有帮助。人类作为群居动物，天然就会向着强者靠拢，而强者无论多强，总要看得到、摸得着才好。如果强者没有一个具体的形象，凝聚力就很难维系。

这就是为什么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走出埃及的过程当中，以色列人动不动就要造一个偶像来搞崇拜，让摩西大为光火。后来在整个基督教历史上，给耶稣、圣母和圣徒造像这种严格来说违背教义的冲动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屡禁不止。没办法，人性就是这么顽固。

当时的政治首领和神一样，作为民众的终极大靠山，形象总是必不可少的。但问题是，越是广土众民的帝国，远离国都的人就越不容易有机会一睹龙颜。统治者能怎么办呢？如果造像艺术发达的话，就可以在全国各地给统治者塑造雕像，还可以把统治者的面容铸造在钱币的图案上。

人怕见面，见面三分情。如果帝国边陲的一名百姓时不时都能看到统治者英明神武的雕像和钱币上的浮雕，认同感和向心力也就自然形成了。

可以对照一下希腊化时代之前，城邦时代的雕塑艺术，艺术家要表现的是完美的人像，人物个性因此不在考虑之列。（其哲学意义，可以参考《熊逸书院》58-1 柏拉图的理念论：神在创世之前到底想了些什么？58-2 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现实主义、理想主义，这些大词到底在说什么？）

某个城邦统治者的雕像，因为配上了特定的器物，或者被安置在特定的背景下，大家才认得出来这到底是谁。

这就像今天我们在中国寺庙里经常看到的四大天王像，假如把每位天王都做成姿态相同的全裸雕塑，你肯定分不出谁是谁。但这并不重要，对于希腊城邦的统治者而言，城邦无非就是一座大一点的镇子，所有人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有自己真人的形象就够用了，犯不着靠造像艺术维系向心力。

大约是亚历山大大帝率先认识到造像艺术的政治意义——毕竟帝国版图太大，而且越来越大，自己的真人形象实在不够用，但缺乏个性、追求完美的雕塑传统显然也不合适，所以，个性化的造像艺术应运而生——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真人加上美颜滤镜。

反观同时代的中国，造像艺术的水平相形之下连及格线都没达到，这可能多少要怪东方人的外形立体感不强吧，反正无论如何，既没有统治者的雕像可供子民膜拜，也没有镌刻出统治者面容的钱币在市面流通，那么随着古代国家规模的扩大，怎样增进向心力就变成了一个很棘手的管理难题。

战国群雄争霸，越是大国，越是面临着版图扩大，管理难度增高的问题。办法大约在战国中后期默默酝酿，后来被秦始皇拿出了一揽子解决方案，那就是不停地巡视各地，增加自己的曝光度，还要在各地兴建行宫，在重要地点刻石立碑，作为自己“到此一游”的永久纪念，给当地人一个可以膜拜的具体物件。

于是我们看到，一个貌似很单纯的，和政治完全无关的艺术水平和艺术发展方向的问题，却深刻影响了东西方国家管理模式的选择，彼此自然也会越来越难以理解对方。

周王朝的平行世界

亚历山大大帝本尊就是一位很难被中国人理解的帝国统治者，因为他是一个比萨特更能体现存在主义哲学精神的存在主义者——他不仅是马其顿人，更是马其顿王，但他看不起马其顿文化，偏偏崇拜希腊文化。

所以在以武力征服世界的过程里，积极向全世界推广希腊文化，呼唤多民族的和平共处，推行地方自治，甚至还用免税政策鼓励本族同胞和外族通婚，一切的一切都体现出西方概念当中“帝国”的标准模式。对照一下同时代的，信奉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中国周朝，差异之大不可以道里计。

同一时期，在中国传统经典开始成型的时期，犹太人的经典文献《塔木德》也在逐渐成型。《塔木德》和基督教的《旧约》关系很近——基督教《圣经》分成《旧约》和《新约》两部分，所谓《旧约》是从犹太教直接拿过来的，在犹太教里是唯一、永恒的契约，是犹太教的全部《圣经》。

犹太教一共有三大经典，通常我们使用音译，《圣经》部分称为《塔纳赫》(Tanakh)，对《塔纳赫》的各种阐释和更加实际的生活指导，汇编成为《塔木德》(Talmud)和《米德拉什》(Midrash)。

同一时期的东方世界，印度进入孔雀王朝。传说王朝创始人来自一个饲养孔雀的家庭，于是以“孔雀”作为姓氏，这和中国周朝的姓氏传统如出一辙。

孔雀王朝定都华氏城，几百年后，佛教僧侣将会在这里举行一场最高规格的学术研讨会，争论“我”到底存不存在，结果正反双方谁都没说服谁，从此各立山头，分道扬镳，这就是佛教史上的第二次大分裂运动，这是我在《熊逸·佛学50讲》里讲过的内容。

再看东方近邻日本，这时候正在从绳纹时代过渡到弥生时代，日本人开始掌握了青铜器和铁器的铸造技术，有学者推测这些技术正是从中国传入日本的。这就意味着，早在传说中的徐福东渡之前，中日之间就已经存在着相当程度的交往了。

最后让我们回到《资治通鉴》，在上一卷“周纪二”的结尾，周显王驾崩，周慎靓王姬定继位。新王虽然继位，但在规矩上，纪年还得沿用旧款，要到下一年才能改元，所以到了下一年的元旦，才算正式进入周慎靓王元年，也就是《资治通鉴》“周纪三”开篇的这一年。

这种纪年规矩，叫作“逾年改元”，属于常例，只有在很特殊的局面下才会破例。

胡三省给《资治通鉴》作注，说周慎靓王的谥号，“慎”的意思是“敏以敬事”，“靓”的意思是“柔德安众”，大意思是说周慎靓王是个敬业爱岗、温和宽厚的好天子。（稍微提一句，如果你手上有中华书局版的《资治通鉴》，那么在胡三省的注释里，有一句“敏以敬曰慎”，脱漏了一个“事”字，应该是“敏以敬事曰慎”。）

当然，这时候的周天子无论是想发愤图强还是想横征暴敛，终归都办不到，再怎么爱岗敬业，也只能温温和和地苟延残喘了，唯一能够奢望的，就是末日来得晚一点，体面一点。

这一年里发生了怎样的大事呢？我们下一讲再谈。

划重点 [添加到笔记](#)

1. 西方造像艺术发达，统治者把自己的面容铸造在钱币的图案上实现影响力。
2. 秦始皇巡视各地、兴建行宫，并在重要地点刻石立碑。
3. 艺术水平的差异，深刻影响了东西方国家管理模式的选择。

#跟着熊大读《资治通鉴》

我们为这门课配套了一个知识城邦学习话题，欢迎你记录学习收获，和其他同学互相交流，一起完成这场马拉松学习。课程老师@熊逸、主编@李倩也会不定期出现在讨论区哟~

[戳此参与讨论>](#)

< 前一篇

后一篇 >

赞赏

1 人已赞赏

如此好文章，快分享给需要的朋友吧！

[微信](#)

[朋友圈](#)

用户留言

默认 最新 只看作者回复

李盈 6月12日 [+关注](#)

#课代表知识卡片#

据历史记载，秦始皇的刻石有《琅琊刻石》、《泰山刻石》、《峰山刻石》、《会稽刻石》、《碣石刻石》、《之罘刻石》、《东观刻石》等七种。可惜的是，现存至今的刻石，只剩下《琅琊刻石》了。

《琅琊刻石》又称“琅琊台刻石”，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始皇颂诗”）刻于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后半部分（“二世诏书”）刻于秦二世元年（前209年），传为李斯所书，属小篆书法作品。

这座刻石目前在国家博物馆的古代中国馆中，遗憾的是这座刻石已经不完整了，残存的是刻石的后半部分。我上周去国博还有幸看到了它，虽然字迹难以辨认，但是笔法婀娜，有机会你可以去国博看一看。

值得一提的是，《琅琊刻石》特别强调了统一度量衡的是秦始皇的丰功伟绩，可见这件事的重要性。至于统一度量衡对加强中央集权的作用，在第一季课程的179讲，熊老师专门做了介绍，有空你可以温习一下。

#跟着熊大读《资治通鉴》

4 6 214 分享